

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内涵

□ 杨英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决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丰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为什么加入分配方式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方式。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即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引者注)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要求,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直到此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涵之一。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中必然包含着相应的分配形式,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何此次《决定》专门把分配方式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之一呢?

《决定》把分配方式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决定》强调,“坚持多劳多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强调,“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对马克思来说,其按劳分配思想的历史前提条件是既消灭了私有制又消灭了商品市场。马克思指出:第一,“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第二,“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而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

《决定》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以说是对按劳分配思想的一个实质性的注解。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目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错综复杂,出口受限的大背景下,提高消费比重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增加劳动者报酬则是一个最为根本的立竿见影的渠道。与此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劳动、资本、土地,作为传统的生产三要素,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演进,已经不能涵盖生产要素的内涵。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可以统统地算作劳动的范畴,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一分子,是随着信息化在工业革命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渐凸显其重要作用的。特别是随着物联网、互联网革命性的发展,“数据”作为信息的携带者,其生产力作用愈加显著,也必然会在生产分配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概而言之,把分配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之一,更好地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更好地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提高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其现实的针对性。

为什么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

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的重大制度保障。

《决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涵,也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回应。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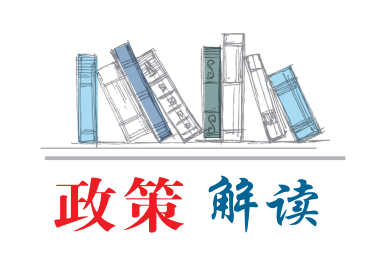
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新时代经济社会诸方面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

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和”字去掉,改为逗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字之改,内涵深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这也正是为什么四中全会《决定》在13个“坚持和完善”中专列一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制度成本。

《决定》从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以及制度保障等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了完整科学的阐释,客观上顺应了新时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主观上也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创新性相契合。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决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必将为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力量,更加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在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中,企业和家庭的决策不仅受到可见成本的影响,也受到各种不见于会计账本,但却实实在在占用相关人力物力的,从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和盈利的物质或人力成本。这些成本可以被通称为隐形成本。隐形成本就像暗物质一样,虽然本身很难观测,但可以通过它对相关经济活动的影响推测其大小和变动趋势。从社会发展角度,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全面降低经济活动成本,减轻企业和家庭负担,除了在税费等可见成本方面给与优惠,隐形成本的降低也是相关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

隐形成本在现实中的例子很多,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比较重要的大概包括以下几种。

流程成本或者说“填表成本”“开会成本”。每个企业或组织内部为了上下沟通和评价的需要,都难免需要通过开会、填表或报告等形式进行信息汇总和交流。一般来说,这些活动被计为员工劳动时间的正常组成部分,不列额外成本。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给定员工每天工作时常是固定的,这部分时间的机会成本就是员工的工资。如果管理者在进行相关安排的时候不把这一点纳入考量,就会产生为了显示流程公正、手续齐全,甚至单纯只是为了“刷存在感”而乱开会、乱组织填表的情况,造成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打个比方来说,在很多企事业单位,财务部门会为了追求手续的完善而让前方工作人员花几十乃至几个半天的时间反复核对一张金额近几十元的报销单据的细节,甚至往返排队数次。在这种情况下,从组织的角度,财务人员为了避免这几十元的潜在损失而消耗前方人员劳动时间造成的隐形成本很可能就要以百千计,倘若因此损失了商机,损失则又要以百万千万衡量。如果整个社会的办事部门,特别是面向商业的政府职能部门都是如此,因此损失的效率和经济增长就十分可怕了。

政策不确定成本。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相关政策环境高度相关。在很多时候,“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虽然可以更快地达到目的,但也可能因此增加企业对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他们的预期回报和投资积极性。例如,在面临最近的市场猪肉供应不足问题时,很多地方都采取各种政策鼓励农民养猪。但由于一些地区在之前一段时间刚刚处于环保等原因关停过猪场且没有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农民即使在看到最近的鼓励政策时,也会因为对未来未被再次关停的担忧,或者还没有从之前的损失中恢复元气而不敢加入。

职业激励扭曲成本。当组织内部组员越来越向少数部门倾斜,或社会内部资源越来越向少数行业倾斜,那么人们对自己人力资源的投资也往往会受到未来期望回报的影响。这可能会造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本来属于技术部门的人才也一定要向管理类岗位转型;或在一个社会里,本来更适合在自然科学或技术行业工作的人才也被高薪吸引转向金融业。这种激励的错配带来组织和社会内部用于技术更新的人力资本越发不足,从而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家庭内生产劳动成本。在世界各地,家庭内劳动生产活动,即通常说的“家务”活动虽然不计入生产成本或产出,但也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并影响着劳动者在家庭外部劳动市场的劳动力供给。例如,近些年,随着“减负”思想的大力推行,各地对减少中小学生在在校时间和关停培训机构的执行力度不断增大。虽然这些活动的初衷是好的,但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就是增加了学生的在家时间和需要家长陪伴辅导的时间。这样就很可能导致一些父母为了专心辅导子女而不得不减少劳动时间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继续保持原来劳动时间的,也可能因为过度疲劳而带来生产率下降。

追责成本。不可否认,健全的问责和舆论监督机制是一个社会良好运行的保障。但随着信息传播的加快,很多企业和个人在今天也会面临由于担心出现负面舆论评价,而在相关经济活动中采取过于谨慎,甚至“因噎废食”式的应对方法以求万全。这种以避责为首要考量的行为模式可能让社会损失很多创新和发展的机会以及进一步增长的潜能。

不可忽视的「隐形成本」

□ 包特

例如,当网约车行业在近几年出现乘客遇害案件时,虽然从统计角度来看,案件的发生似乎很难说明网约车是一种比其他交通模式更不安全的交通模式。但面对网络上汹涌的负面评论,相关企业和监管部门还是采用了关停甚至取消相关业务的方式应对舆论。从经济学角度,这会不可避免地减少乘客的选择空间和出行效率。

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隐形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非计价生产要素的意义和价值的忽视以及由此带来的使用上的低效乃至浪费。同时,激励的错配也是低效和浪费的重要来源。

要降低隐形成本,我们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把隐形成本显性化,纳入成本收益考量。比如,要降低流程成本,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每次开会、填表活动的隐形劳动成本按参会者或填表者的工资作为时间价格进行核算。提出“向开会要效益”,给定开会或者填表成本,不“赚钱”的会不开,不让不“值钱”的表花费填表者过多的时间。

第二,为生产者面临的风险和责任提供尽可能多的保护和保障。在制定政策时,尽量保证其常态化 and 长效性,并充分考虑到未来政策变动可能对利益相关者带来的损失以及相应的补偿和保障机制。力争做到任何一项政策的推出都不让响应者在未来因为政策的变化吃亏。

第三,创立尊重科学技术和优待科技人才的社会氛围,完善非管理岗位的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和薪酬体系。

第四,重视家庭内部生产活动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鼓励“家庭—工作平衡”的工作时间安排,但同时,在公立学校课时缩短的情况下,也要给学生托管和教辅行业给予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避免“学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的蔓延和恶化。

第五,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但在具体监管事务上,尽量更多从相关法律中寻找依据,而不是为避免争议简单一禁了之。



全球价值链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资本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坚持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

全球价值链分工已成为当今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

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成长为全球制造生产基地,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且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增长,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近年来稳步提升。但在全球价值链形态的产品内分工体系下,我国仍相对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价值链中,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组装加工环节,出口高端零部件,我国在完成组装后出口到全球;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中,其他发展中国家向我国出口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我国以国际产能合作、国际工程

承包等方式,引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重要衡量指标。这要求从制度、规则、合作、开放、竞争等多个层面提高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和水平。同时,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来强化本地企业生产能力,尤其是通过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产业链升级实现企业升级来塑造新的竞争优势,进而持续增强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增加值获取能力。(毛 强)

